

■ 行走

走近三八线

□ 李鸣生

2002年4月23日上午9时,我从汉城驱车出发,沿着“自由路”,由南向北,前往著名的三八线。韩国朋友告诉我,昔日的“自由路”是一条乡间羊肠小道,南韩总统金斗焕当政时,要去板门店与朝鲜和谈,便下令抢修、拓展了此道,并命名为“自由路”。现经“自由路”从汉城到板门店,只需一个小时。

说来很巧,这天正值韩国军队军事演习。“自由路”的两旁,坦克林立,遍地掩体,一排排荷枪实弹的士兵巍然挺立,一辆辆军车不时隆隆驶过,给人一种如临大敌、奔赴战场的紧张感。头顶的上方,是数十架精巧的美式巡逻直升机,盘旋于洒满阳光的天空,发出嗡嗡不停的声响。而最吸引我的,还是“自由路”两边一堵堵用石头和泥砂砌起的土墙,这些土墙韩国人称为“5分墙”,所谓“5分墙”,即战争一旦爆发,坦克在5分钟之内必须将这土墙推倒,以阻止、延缓朝鲜的军事进攻。据韩国军事专家预测,一旦战争爆发,朝鲜军只需1分40秒便可抵达汉城,这就要求韩国的第一线军事力量必须顶住前3分钟;而要想赢得整场战争,汉城则必须顶住前3天!因为美国的航空母舰需要3天时间才能抵达汉城。

汽车驶过一段路程,来到离朝鲜领土不远的临津阁。临津阁存放着有关朝鲜的不少资料,画报以及朝鲜战争期间曾经投入使用过的飞机、坦克和大炮。临津阁的左侧,“和平石”静默矗立。“和平石”从世界各国的战场搜集而来,上面刻录着与朝鲜战争相关的史实,旨在告诫今天有幸活着的人们,莫忘那场战争以及在那场战争中死去的士兵。而与“和平石”相对应的,则是一口巨大的专供人们祈愿和平的“和平钟”。临津阁的左后方,是令人伤感的“自由桥”。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署后,为交换战俘,韩朝双方在此架起了一座长83米、可沟通韩朝领土的木桥。于是12773名战俘通过此桥回到了自己祖国的怀抱,故此得名“自由桥”。“自由桥”桥头的左侧,塑有一石碑,上书“望乡”二字。“望乡”碑的背后20米处,便是“望拜坛”。韩国人思念朝鲜的亲人而又无法越过三八线,便在此建造了“望拜坛”,每逢清明,思念朝鲜亲人的韩国人便纷纷到此,先点燃一炷香,再面北跪地,磕上三个响头,以寄哀思。韩国朋友告诉我,从2001年起,南韩政府放宽政策,首次允许韩朝亲人在汉城相聚。但相聚的人数限定100人,且须在指定的地点、规定的时间内相见,不得回家,更不能到处走动。有一位韩国老太太,得知盼望了几十年的儿子终于可以从朝鲜来汉城时,当场晕倒,被送进了医院。所以当儿子从朝鲜匆匆赶到汉城时,老太太错过了预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最终还是未能与儿子相见。据我后来了解,韩朝至少还有100多万骨肉分离的亲人,未能获得相见的机会。

从临津阁再往北,便踏上了警卫森严的“统一大桥”。“统一大桥”检查严密,气氛紧张,所有路经此桥的过往行人,一律不准下车,更不准拍照,一旦发现有人拍照,立即收缴胶卷,当场曝光。我的车刚一停下,一个荷枪实弹、满脸涂着彩妆的韩国士兵便来到车上,逐个验证护照。士兵形象实在诱人,我趁士兵低头认真检查别人护照之机,偷偷拿出相机,快速按下快门,不料闪光灯一闪,被士兵发现,立即制止。我佯装不懂,摆手表示歉意。也许同为人,心有默契,士兵居然破例没有收缴我的胶卷。

■ 讲述

伊维德与弘治岳刻本《西厢记》

□ 蒋星煜

我研究《西厢记》多年,在国内,得到了赵景深教授的指导,此外,与王季思、吴晓铃、马少波、傅晓航、周续廉、黄裳诸位也有过许多交流。至于日本以及欧美研究《西厢记》有较高成就的汉学家,也都先后有多次沟通,这对于我的研究工作当然有许多启发和帮助。

改革开放之初,即1982年,就有一位荷兰雷登大学的中年教授伊维德(W.L.Idema)来访。虽然他的汉语普通话不太流利,写的中文却相当规范,英语则是第一流的。我们的话题是明代朱权的生平与《太和正音谱》、朱有燾的杂剧著作以及《西厢记》的版本问题。

谈了不久,两个人就把话题集中到了《西厢记》的版本及英译问题上来了。因为到1980年为止,世界各国的译本基本上是以改得面目全非的金圣叹本为主,再就是王骥德本或凌濛初本了,而且大部分是摘译片段,而非全本。现在既然已经发现了弘治年间的金台岳刻本,应该最接近元代王实甫原作,当然应尽快译出来才好。关于这一点,我们达成了共识。

接着,他向我表示,已经下定决心,准备自己动手翻译,也可能和别人合作进行,我当然表示十分赞同。然后我们也研究一些具体问题,诸如体例、注释以及附录取舍等等,彼此出入不大。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走出他以后,没有再联系。因为工程浩大,我担心他是否能实践这一雄心壮志。

这次交流之后,我对《西厢记》在全世界传播的情况开始关注起来。1985年,我在华东师大担任客座教授,也对我带的研究生谈起这件事情。其中,一位研究生英语基础较好,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写《论〈西厢记〉的英译问题》。为了辅导他,我又比较认真地阅读了这个译本的文笔还是相当好的,但是采用的底本和所有的外文译本一样,仍旧存在和原著相距甚远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既深深钦佩伊维德的有胆有识,更希望他能尽早完成这一

过了“统一大桥”,进入一个神秘山谷。山谷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一路都是地下工事及荷枪实弹的韩国士兵,两边的石壁和电线杆上则随处可见“恒在战场”、“认真站岗”等韩文标语。等车走到再也不能往北走的地方,便见到举世闻名的三八线了。

二

三八线是位于朝鲜半岛上北纬38°附近的一条军事分界线。二战末期,盟国协议以朝鲜半岛北纬38°线作为苏、美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日本投降后,此地成为韩国和朝鲜的临时分界线,通称“三八线”。朝鲜战争结束后,在三八线的基础上调整南北军事分界线,划定临时军事分界线两侧各两公里内为非军事区,习惯仍称“三八线”。

非常遗憾的是,我眼前这条长246公里、宽4公里的三八线,与我此前想象中的三八线完全不同,倒与我10年前在中越边界看到“100米生死线”的感觉十分相似:未见时充满好奇与神往,见了后又觉平淡无奇。不过,身为军人,站在三八线前,用不着低头,也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血腥气息!

半个世纪前发生在我脚下的那场战争,据说一共死了大约300万人(包括军人和百姓),其中中国志愿军就达数十万!关于中国志愿军死亡的确切人数,我所知的版本有好几个,有的说13万,有的说15万,有的说30万,甚至有的还说70万!我此次在韩国也无意做过调查,到底是多少,依然无所确定。但我想,当数十万鲜活的生命化作一长串冰冷的数字后,无论多少都是一件极其令人痛心的事情。而更令人痛心的,还有那21000名志愿军战俘!在这21000名志愿军战俘中,有6000多人有幸活着回到了祖国大陆,14000多人有幸活着去了宝岛台湾。志愿军60年108师政治部主任吴成,是当时志愿军战俘中职务较高的一位,据他后来回忆,这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回到祖国大陆后,全部集中在辽西昌图县,一面学习形势一面恢复身体,后来就开始交代问题。在交代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始终得面对这样的质疑:第一,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本身就是右倾怕死,就是可耻,为什么不和敌人拼死或自尽?第二,一个怕死被俘的人,怎么可能和敌人坚决斗争呢?因此只能交代过错,不准谈有功,功过更不能相抵。第三,只能在主观上深挖错误原因,不能从客观上找理由。结果,在这种极左思想的支配下,拼死回归祖国的这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几乎都被认为是右倾怕死变节!

至于去了台湾的14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在此我只说两个细节:一是送往“心战总队”,天天强行洗脑;二是在手臂上强制刺上“反共抗俄”四字,以断绝回大陆的后路。他们各自最后的命运,可想而知。

转眼间,战争已结束了几十年,但韩朝双方依然戒备森严,剑拔弩张,依然恨之入骨,寸步不让。据悉,50多年来,非军事区两边双方共部署

着大约150万的兵力,使这里成为世界上驻守军人最多的军事分界线。据韩国国家情报院评估,目前朝军在三八线非军事区一带部署有13000门火炮与多管火箭炮,而远程火炮具有打到韩国汉城的能力。因为汉城离分界线只有50公里,所以有专家说,汉城如遭朝鲜首轮炮击,“打回几十年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朝鲜远程炮兵掌握一整套“打了就躲”和“打了就换阵地”的战术,并能在75秒内完成“发射—返回地下坑道”的全过程;而火箭炮打完全部火箭弹只需要44秒,便可消失在地下坑道中。

可惜,韩朝各自敌视的结果是,韩国乘上了现代化的快车,成了亚洲的“富翁”;而朝鲜实行锁国政策,最多算个“中农”。

一位韩国朋友告诉我,由于贫穷,朝鲜每年都有上百个“投奔自由的人”不顾死活地奔向韩国。有的被遣送回去后,或残,或死;而那些有幸活下来的人,也会再次跑往韩国。凡过来者,韩国送给3000万韩币,先让你住下,然后再盯上你3年,等考核合格,再还你自由。这些人到了韩国后,干点料理之类的买卖,居然也赚了不少钱,日子很快由穷变富。据说,由于南富北穷,悬殊甚大,有的韩国人一想到朝鲜人,马上便会想到“穷鸟入怀”这句中国成语。所以相当多的韩国人尤其是韩国富人,最怕的就是朝鲜人在某个黄昏或者某个清晨,突然从天而降奔来汉城。

不过近几年韩朝关系似乎有所改善,2000年韩国派了一个合唱团去朝鲜演出,朝鲜也派了一个马戏团到韩国来表演,结果彼此都很欢迎。后来韩国还为朝鲜送去了大米,但很快就有韩国人站出来反对,说,这些送去的大米如果被朝鲜政府拿去作了军粮,喂饱了士兵再过来打我们,怎么办?后来韩国便改送化肥,意思显而易见:你们不是天天都在疯狂呼喊“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嘛,那就自己种地去吧!

三

其实,站在三八线前,最能看清朝鲜的地方,当属罗山瞭望塔;而罗山瞭望塔最先吸引我的,是瞭望塔上方用韩文赫然写着的两句标语——“分端的结束,统一的开始!”

此类标语在韩国不少,但惟独写在这里,让人感到很有分量,意味深长。

走进罗山瞭望塔,向北望去,一片苍茫忧郁的朝鲜领地便尽收眼底。我刚一坐下,一位英俊的韩国军人便行了一个标准的韩国军礼,而后手持一根指挥棒,一边指点着朝鲜,一边讲解说:“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距汉城40公里,离北韩12公里。前面,便是南北禁止入内的军事缓冲区……”军人讲毕,又道:“这儿有两架望远镜,愿意观看者,可仔细观看。”

我走到望远镜前,从正前方向北望去,中间大约长200多公里、宽4公里的地方便是南北的缓冲地带。缓冲地带里有一片小树林,似是隐约可见一个小湖泊;再远处,便是朝鲜的松岳山和开城市郊区了。这里与韩国相同的,是清新舒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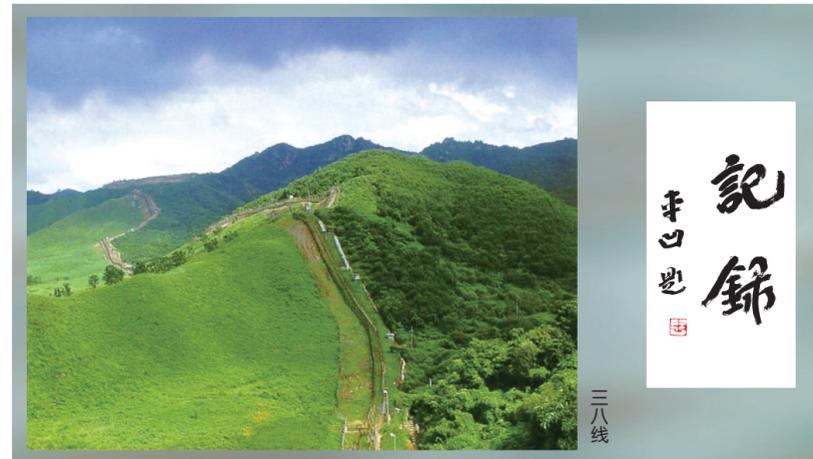
的蓝天白云;不一样的,是死气沉沉的荒芜山脉。据说,朝鲜为防止有人逃到韩国,有利于边防卫士对“叛国者”的监视,曾下令砍光沿线山上的所有树木。所以,此刻在我的眼里,位于三八线附近北边的所有的山头,一个个都像被人剃光了头发的脑袋。

而右前方4.5公里外,便是著名的板门店。板门店是三八线上离朝鲜最近的地方,因当年参加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的中国代表在会谈场所附近的一家商店标注了“板门店”三个字而得名。板门店以军事分界线为中心,为直径800米的圆型,由联合国军和朝鲜军共同警备,故又称共同警备区域,属韩朝双方行政管理管辖之外的特殊地段,现为韩朝双方会晤及开会场所。自1953年7月27日韩朝双方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以来,板门店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始终被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因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神秘之地。但自1972年7月4日韩朝共同宣言发表后,板门店便成了韩朝首脑会晤的场所和红十字会的聚集之地。

板门店的旁边是一座塔,塔上迎风飘扬着一面旗。旗为白色,阳光下,像昭示着什么。这面白色的旗,是韩国的旗。而对面的上空,同样也迎风飘扬着一面旗,旗为红色,阳光下,又似乎在诉说着什么。这面红色的旗,是朝鲜的旗。朝鲜的旗高达158米,威严高大,挺拔耀眼,号称“世界最高之旗”。这面“世界最高之旗”此刻正迎着金色的阳光呼呼飘扬,在我眼里简直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在疯狂地煽动着半个天空。半个多世纪来,南旗北旗,一白一红,相距仅1.8公里,遥相厮守,又相对而立;相依为命,又彼此敌视。两面国旗如同两位重量级的拳手,谁都很不得一拳打倒对方,但又谁都不好轻易出手。

此时此刻,望着不在一种社会制度却偏偏在同一蓝天下猎猫猎鼠的两面国旗,我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我想,旗帜对于一个民族当然重要,但关键是要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文明发展的趋势。韩国与朝鲜的同时存在,似乎有点像上帝的有意安排:两个国家,同样的传统文化、差不多的国土面积、基本相似的自然资源,却被历史塑成了天壤之别。

再往西望去,便是朝鲜军方悄悄挖掘的第3地道。也许是为了中国地道战的影响,朝鲜从本土穿过三八线,暗中挖了不少从朝鲜通往韩国的



在英国这样一个非移民国家里,街上很少见到亚洲人。去中国超市或者教堂,才能够遇到会讲汉语的大陆人、台湾人和香港人。

通过友人的介绍,我认识了黑人女孩碧溪。她年纪三十,闺中待嫁,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有一双大眼睛,皮肤细腻光滑,笑起来很甜美,和大多数黑人一样,有一口雪白整洁的牙齿。

刚刚认识碧溪时感觉她不苟言笑,比较严肃,不太好接近。我们主动和她搭话,她才渐渐地活跃起来。碧溪的中文说得很好,她曾经在台湾边读书边传播基督教,度过了两个年头。我问她喜欢台湾吗?她说喜欢,并告诉我们,她从北到南走遍了整个台湾,台湾各处的风景和食物都很美,各具特色。

碧溪陪我们去诺丁汉游玩,一路上她侃侃而谈,和我们就像相识已久的朋友。她听我女儿说我学过中国画,非常兴奋,提出要跟我学习中国水墨画。想起一星期前她不善言语的表现,与眼前这个活泼的碧溪判若两人。我猜想,是由于种族的自卑感和防御心理使那时的她故作清高吧。当她见到我们并不因为肤色的原因而歧视她的时候,便自然愿意亲近我们。我女儿有相同的感受,她说,在大学里的法学院,黑人同学居多,他们选择将来从事法律工作,想在法律面前求得人人平等的权利,这完全能够理解。中国大陆的学生对商科很感兴趣,加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金融、贸易领域的人才,大陆同学多选择就读商科专业。

我女儿所攻读的博士专业很有意思,简单通俗地说,是研究东西方儿童文化心理的比较。她的课题需要做社会调查,否则,论文将无法进行。我来英国探望女儿,自然希望和她一起走出去,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人情世故。

我告诉碧溪,如果她到北京的话,可以事先和我联系,在北京游玩期间欢迎她来我家住。她说,她还要存一些钱才能够实现去中国旅游的梦想,而且她愿意和贺拉斯夫妇一起去,他们的中文没有她说得好,她愿意给他们当翻译。

她所说的贺拉斯夫妇是一对英国白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碧溪驱车带领我们去了贺拉斯的家下午茶。这是一座典型的英国二层小楼。我们在碧溪的带领下,走进了一个用花篱环绕的院落,女主人热情地走出房门迎接我们。碧溪的贺拉斯有着漂亮的金发、碧色的眼睛和苗条的身材。她举止优雅,笑容得体,先拥抱了碧溪,接着向我和女儿伸出了双臂,将我们逐一拥入怀中。基督徒是不偏心的,他们要公平地对每一个人。表示友好的方式也不例外,无论新老朋友,一视同仁。

贺拉斯的丈夫站在房门口礼貌地迎接我们的到来。走进贺拉斯的家,我把一束粉红色的郁金香送给她,贺拉斯很高兴地向我表示谢意,将鲜花浸泡在花瓶里。这个家很温馨,一楼设有客厅、厨房、餐厅、多功能室、卫生间、二楼为卧室。走出一楼客厅是阳光房,顿时感到异常的温暖和明亮。从这里走出去是一个约百十平方米的庭院,眼下正是早春时节,院子里生长的绿色植物很茂密。

坐下来后,主人招待我们分享下午茶。内容是英式果茶、奶茶、咖啡和点心,还特意把中国茶“铁观音”拿出来,请我们各取所需。他们用英语和不太流利的汉语跟我们聊家常,之后跟我们讨论了《圣经》。这让我不由得感慨,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了。平日里我看到许多外国人为了向中国传授基督教,执著地学习中文,我会想,下这么大的功夫,值得吗?但是他们非常愿意了解中国,我接触到的很多英国人曾到过中国旅游。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大物博、风景优美。他们也乐于分享自己的信仰,认为信仰可以让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更加和睦相处。

碧溪和贺拉斯完全用中文朗读、讨论圣经,交谈中有吃不准的句子就向我求救。而我是个不合格的老师,只能为自己开脱,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太神奇、太复杂了。有时候对某个成语或句子,我没有办法给她们以恰如其分的解释。她们虽然听得一知半解,但还是很愿意做进一步的交流。

通过这样的交流,不但能让英国人更好地认识中国,也为我了解异国的风情和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

认识碧溪

□ 梁兵兵

